

此电子书由习之网 www.5sgou.com 搜集
于互联网. 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 如要支
持作者, 请购买正版

资中筠自选集(全五卷): 不尽之思

作者: 资中筠

不尽之思 第一部分

自序(1)

本人忝列“学者”圈, 以笔耕为业,
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
文字都是奉命之作, 多为“内部”报告,
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 也多为应景
文章, 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
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
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

西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说来，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 90 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 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

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

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说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

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

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竖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

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自序（2）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

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

2010 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 1980 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

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

《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

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

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自序（3）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

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

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 GDP 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

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

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X国人”。因此，近年来日

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国格与人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

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关于我的履历

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

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

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做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在特殊的政治风云中曾红极一时，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说来颇“吸引眼球”，可能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

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

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

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

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我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近有各种版本关于我的简历介绍，常有错误和不确处。以下附上我认可的简历，事实以此为准，详略可自行摘取。）

资中筠简历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1930 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
1947 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

大学，1948 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 年毕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以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 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专

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多次访美，从事学术交流。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研究员各一学年。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 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

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利坚》）、《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利坚》、《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斗室》和《读书人》的一些文章。）

译著：（法）巴尔扎克《公务员》、《浪

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等。

不尽之思 第二部分

春蚕到死丝未尽（1）

这大半年以来我一直在逃避。不少杂志报纸来约稿，似乎我最应该写些什么，但是我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现在这本书画集（《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要出版了，我不能再逃避，于自己，于编者，于读者，都应该有所交代。只是开过几个头，每一进入境界，就悲从中来，不能自己。

先从本文题目说起。乐民去后，我和女儿一同整理他的遗物、遗稿，发现竟有那么多未发表的文稿、笔记，还有那么多书画，大大小小随便卷起的宣纸算来起码有几百幅，外加扇面和几本织锦面的册页。书桌上随便放着一页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把一切麻烦之事都摆到理性的天平上，忍耐、坚持、抗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回不是毛笔而是圆珠笔写的，而且显然笔已经拿不稳了。这是他最后进医院之前留下的字迹，那时他已经身心衰竭，大约自己有所预感，所以写下这几行字，代表最后的自勉。我脑中突然冒出来：蜡炬已成灰，春蚕丝未尽！

作为“未亡人”，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将这些未尽之丝留存人间，不让它灰飞烟灭。

他自己未及看到的遗著首先是《对话欧洲》，他看到了校样，却来不及见到成书。下一本是《启蒙札记》，以过去近两年来连续在《万象》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为主，连同其同一题材的文字集结出书。还有一本他自己初步整理的随笔，自题为“碎石集”，也在进一步归纳、编辑，可出一文集。另外那几十本读书笔记，欧洲所已“立项”，由几位生前同事先仔细阅读一遍，以便决定是否或如何整理成可供发表的作品。

乐民的习惯是，凡读书有所得，就随手记下，起初并不想到发表。第一本

《书巢漫笔》是在一位青年学者帮他整理文件时发现后建议下才结集出版的。

此后学者随笔散文蔚然成风，“需求”日盛，他也就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到一定时候集结成册，陆续出版了几本集子。不过他的读书笔记还是远超过已经发表的。他留下的几十本笔记本大小、规格不一，每本分类却很清楚，如“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伏尔泰”、

“老子”等。里面密密麻麻一段一段地抄录原文，有中文、有外文，段后有“乐民识”就是自己的评论和心得。其中少部分已纳入文章著作，而大部分只是素材，是准备日后写作的基础。其实这是老派学者的传统，先有给自己看的或不

知道做什么“用”的笔记，然后才考虑发表给别人看。曾在《文汇报》见到一篇关于钱基博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以其读书笔记为基础的，并留有大量待整理的笔记，惜全部毁于“文革”，我就想起乐民是承续了这一传统。这里只是讲这种读书写作的方式，当然不敢与先贤相比拟。他始终坚持那一代读书人的传统，可以当“厚积薄发”而无愧。

至于书画，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表，甚至很少示人，纯粹是自己的寄托。堆到一定时候，自己粗粗整理、卷起，找个架子存放。以至于我直到他去后仔细展阅，才意识到作品量之大，而且倾注

了如许心力，包含多少深意。于是在家里有限的条件下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展示（不能称“展览”），主要请“三联”的朋友们来做一番评估，是否可以选出一部分印刷出版。我认为，如果要做这件事，非“三联”莫属。因为乐民不是专业书画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名气，如果不是与其人、其情、其学、其“气”联系起来，就意义不大了。而“三联”的传统具备这种综合的文化底蕴，还有与我们有多年交往的几位资深编辑能对此人、此事有足够的理解。果然，他们来看了之后，不用我多说，对于应该做、如何做，很快达成共识。事后，出版社的领导立即做出决定列入计划，立即按

部就班地着手进行起来。这一切都令我感动——为乐民身后未尽之丝，也为出版界延续未断的文脉。

春蚕到死丝未尽（2）

选入本集的只是大量帙卷中的一小部分。就入选的比例而言，画可能是三分之一，而字大约只占总量的七八分之一。我们这一代人的沉浮、哀乐，包括闲情，都离不开政治大背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钢琴与政治”，是说我少习钢琴，到“革命”的年代放弃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开始宽松，又恢复弹琴。乐民的写字作画大体上也如此，始于少年，中断于那“革命”年代，上世纪80年代又再捡起。不过书法与弹

钢琴不同，并未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大约与革命领袖喜好书法有关。

“字写得好”总算是一长处，有时还有一定的用处，例如被叫去写一些宣传标语、丧事的挽联、花圈飘带之类。我曾以《祢衡骂曹》中的戏词揶揄他：“荀彧、荀攸，可使吊丧问奠。”他就接过来常以此自嘲。这种红白之事，他直到80年代还为慎之先生做过。一次是一位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荣休，所在的大学为他举办一次隆重的会议，请老李参加。老李无以相赠，决定送一幅字，词是他自拟的，但他与我有同一遗憾，就是自认为毛笔字拿不出手，于是让乐民写，而且以他特有的坦率说，这回你得做无名

英雄，我不会告诉美国人是 你写的。另一回是 1992 年钱锺书先生报病危，老李准备好一副挽联，让乐民写。但是后来钱先生出现转机，拜现代医学之力，又延续了几年寿命。待钱先生去世，已时过境迁，老李没有再提起这副挽联。经由老李后人提供，得以收入本集，即“万流失依倚，百代仰宗师”。至于“石蕴玉以山秀，水含珠而川媚”这对条幅题的是“书李慎之词”，从何而来，已无法考证。乐民大概比较喜欢这两句词，写过不止一幅，并以词意作画。

他还有一桩“光荣”事迹：1955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齐白石“国际和平奖”，那奖状上面的中文文字是他写的，

当然是奉命之作。说明当时他的字在本单位已经得到公认。本书责编杨乐女士居然从网上找到了这一奖状의影印件，令人惊喜。奖状另一边就是毕加索画的著名的和平鸽。

上世纪 50 年代我们在维也纳时，大约因当时的领导氓公（李一氓）的喜好，竟备有文房四宝。乐民间或写写毛笔字，有时给领导写汇报也用毛笔。他还用毛笔写过他喜欢的鲍照的诗句：“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这使我隐约感到他有些怀才不遇之意，当然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是不能公开表达的。最近他的老同学、挚友蔡鸿滨君给我的信中提到他们中学毕业时，乐民赠他两句诗，

正巧就是这两句，可见他自少年即对这两句情有独钟，也算得上是“少怀大志”。还记得在维也纳时他用墨笔画过一幅松树，自己很不满意，题字曰：“此树以画柳之笔画松，故败。”我对此印象较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还会画国画。有一次出游遇雨，雨景甚美，他回来写过一首诗，我只记得两句：“缥缈米癫意，苍茫大痴笔”，并给我讲他如何欣赏米氏父子。那是在领导暂时回国，我们单独留守国外的短暂期间。在兢兢业业恪守纪律的同时，相对说来工作比较轻松，心情也比较宽松，还容得下一些闲情逸致。我那时在政治上一直在“没有改造好”的紧箍咒中，而另一方面私心却还

有一点自负，唯一有自知之明的弱点是写不好毛笔字，始终是我的遗憾，所以对他的一笔好字不由得有所心仪。这可能是后来被“争取”过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后来我们就奉调回国，接着又“运动”不断，他不可能再有那闲情逸致了。

春蚕到死丝未尽（3）

他重拾笔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初只是写字，90年代以后才想起作画。那时分配到了一套共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是我们第一次有了独门独户的居室。除必要床具等之外，只摆得下一张三屉桌，两人共用（女儿已经上大学，周末和假期回来住），颇受限制。

偶然写写，也没有想到保留。

本集选的 1983 年 1 月自撰的那首诗有一点来历：我们搬进那套新居后不久，总是闻到一股臭味，盖因居室壁橱的墙毗连楼梯口的垃圾室，墙有缝，所以飘臭。时间长了，如入鲍鱼之肆，我以阿 Q 精神戏曰：“斯是臭室，唯吾德馨。”乐民就写了“唯吾德馨”四个大字钉在墙上，不久就脱落，不知去向，那首诗总算保留下来。

1987 年搬入东总布胡同新居，条件有所改善，各自有了专用的书桌。他的字画也多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本集中那幅写滇池大观园长对联的字，自题称“自陋室迁至漏室第一砚”，日期“1989

年”当是 1987 年之误。“漏室”云云，是因为喜迁新居后，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常常漏水，不仅下雨漏，晴天亦然。漏、陋谐音，从此就以“陋室”名我们的住处，直到迁至芳古园仍沿用此名。

从本集所选入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于上世纪 90 年代上半叶创作最多，显然那个时期创作灵感特别旺盛，腕力也还可以。辍笔多年，他在重练基本功上下了不少工夫，废稿三千可能夸大，但确实丢弃了不少。留下来的中间大量纯粹是潜心研习之作，所以各种字体、画法都有。就画而言，算起来他除了少年时学画外，后来重新练手一共只画了十年。这里选入的临王石谷长卷，也可算是重

拾画笔之初的练笔。因为他不是“家”，所以编辑和我们都同意，选择的标准不一定着重技艺，而主要看内容能表现其人的气质、精神和情怀。所以有几张显然腕力不济，歪歪斜斜的字也选入，以见最后的心境。他多数是借古人词抒己怀，少数几首自己写的诗。有时题款、日期，都有深意。从这些书画可见其复杂的心境于一斑。他自己写一条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是一种表达，但不足以概括全貌。我觉得还有内省与外向、知命与抗争、失望与希望、悲情与乐观之起伏。重拾笔墨这二十多年，与他伴随的是“不可逆转”的病与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乐天知命，

却并不甘心，写了许多自勉的话，直到最后一次进医院的前夕，已经处于浑身无一处不痛，只能在轮椅上生活的境地，唯有大脑是健全、清楚的，自知离“蜡炬成灰”不远了，仍留下“忍耐、坚持、抗争”字样，为自己鼓气，始终不放弃。

他最重复写与画的是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用得比较多的是“云无心以出岫”那枚闲章，这是他对“误落尘网中”一生的自叹。但是他并非真正的退隐山林，脱离尘世，只是极端厌恶官场政治，不愿意“以心为形役”，要回归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心灵，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进入“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境界。这对西方知识

分子来说本是寻常事，而对于中国的“士”说起来，如果不走“仕途”，就只有归隐。即使现代，仍须作为“毛”依附于某张“皮”，“帝力”无时不在。求独立、自由，谈何容易！需要相当的定力与对威胁利诱的抗拒力，古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借用。这是外人以及习惯于在“帝力”笼罩中而不自觉的当代学人所难以理解的。乐民何尝对人间事有须臾释怀？否则何必“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孜孜以求“启蒙”之道？最明显的是1989年6月的那副扇面，写《阿房宫赋》尾与贾谊《治安策》头。1994年追画1989年旅欧时的景色，还要记上某月某日某某去世。这些都是伤心人别

有怀抱。1991 年应赵宝煦教授索字写的那几首诗是 80 年代初作的，当时心情特别舒畅，到 1991 年就不会写出那样的诗了。

春蚕到死丝未尽（4）

他喜欢倪林云，有时效仿其风格，但也不都是清瘦淡雅。例如 1993 年册页上的“风疾、云快、松狂”，那在狂风中的松树就令人感到心潮澎湃，有一股必欲一吐之气。他有悲愤、有深刻的失望，却从无颓唐之气，所以他对叶圣陶那首诗有所会心：“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抄录过好几遍，连字体都模仿叶老的。大约 1987 年，我们同赴江西参加一个会，得游庐山和朱熹的白鹿书院，

他从中得到不少书画的灵感，特别是白鹿书院的那一方水池和朱熹的那首诗：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成为他重复写和画的主题。这与那枯树干上几朵红花的寓意有相通之处，象征着一派生机。1998 年他开始血透，初不适应，曾晕过去不省人事，过两天恢复后，作诗画，仍满怀信心云“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那画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

有一首词，他写过不止一遍，也入画，就是宋朝无名氏的“水调歌头”。这首词有一段来历：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复三先生 1989 年赴欧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选择了留在国外。据说此间

当局曾设法动员其回来，详情如何非我所知。有一次有人出国，已从高位退下的胡乔木与赵有旧交，写了一幅字托人转给他，写的就是这首词。这幅字送出去之前我碰巧见过，回来与乐民提及。我们猜不透送字人是正巧想起这首词，随便写的，还是借古人之词寄托深意。乐民原来对这首词颇欣赏，由此契机重新翻出来，就此成为其书画的题材之一，那倒真没有什么题外之意。

平心而论，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们的居住条件陆续有所改善，一个一个台阶上，因而写作的环境也略得宽裕。但是与此同时，乐民的健康却开始出问

题，一个一个台阶下。何方兄的纪念文章中提到，1987 年访美之行乐民不愿出门，宁愿在旅馆看书。实际上，除其他原因外，也因身体不适。那一次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就病倒了，回来后到医院没有查出所以然，随使用些药又似乎没事了，也就不再理会。直到 1992 年大发作，医院才做彻底检查，确诊为慢性肾衰竭，已经是中期，不可逆转，只能尽量延缓其发展。病的起因与开始的时间未能查出。大约至少从 1987 年那次出国开始，病魔已经悄悄上身。还有一则外人想不到的，就是两年后那场变故对他身心打击之大。他是忧心很重的人，那时又处于一个单位的领导地位，其心理的煎熬

旁人难以想象，唯我深知，因为我们处境和心境完全相同。不过我前期不在国内，少一点直接刺激，而且身体没有病，回来后见他形神俱疲，只有相对无言。从那以后，他身体下了一个台阶，但思想却上了一个台阶，精神上彻底摆脱了三十年的“尘网”，回归本真，顿有所悟，自此进一步对个人、对民族、对人类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反思实际上还没有结束，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春蚕到死丝未尽”。

他最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在中西之间。他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之判断，不管被扣多少“西

方中心论”的帽子，中心不改，老而弥坚。而另一方面，他于中国文化浸润之深，感情上的迷恋，也是我们同代知识分子中所少有，应属于上一代。他对中国画从艺术上评价极高，但是仍认为缺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那样一种朝气，那种向过去告别、面向未来的气度。另外，他的治学取向在一个“通”字，与当代学术分科日细的倾向，特别是盛行的“课题制”格格不入。他专业归属是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常自叹入错了行，那是极为实用主义和功利的学科。他游弋于文、史、哲之间，而文、史、哲界都“不认”他。当然，所谓“国学”更没有他的份，而他对“国

学”的提法本身就不以为然。加之他的文风简约、含蓄，如他一幅字写的“藏锋敛态，寓工于拙”，在这阅读快餐化的时代更少人能静下心来细品其中意。宜乎其常有知音难逢的寂寞感，说他的书没人看。其实，他并非没有读者，《欧洲文明十五讲》最近已第九次重印，就是证明。不过总的说来，他的读者大多在“专业圈”以外，老、中、青都有，而老年多于青年，可能有一定的阅历才解其中味。湖南朱尚同兄就可算一位晚年知音。本集的文章可以为证。

春蚕到死丝未尽（5）

朱尚同兄许乐民为“中国欧洲学的奠基人”，是否当得起，而且中国有没有

那种打通了的“欧洲学”，应由同行去评说。不过“中国的欧洲学家”（法语为eurologue）却是欧洲人首先称呼他的。那是1992年他最后一次访问欧洲，先是被作为任务，率社科院学者团到法国作学术交流，以后应邀到日内瓦大学作演讲，题目是“对欧洲统一的想法”。那时欧洲一体化在欧洲人中间正是众说纷纭的话题，以中国人谈这个话题，还能说到点上，引起欧洲人很大的兴趣。会后许多欧洲人纷纷前来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有人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可惜那一次他是带病勉力而去，回国后就被宣判病情，从此再也没有跨出国门，无

法做这方面的交流了。不过那次回来他还是对日内瓦之行很满意，向我讲述被称为“欧洲学家”的情景，虽无夸耀之意，也是极少有的自得的表露。假设他不得这样的病，后来的十年赶上中欧交流长足的发展，他在这方面应大有可为。当然，这只是“假设”。他最后在中西之间又有新的感悟，有所升华。如他最后的日记中所说，他致力于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找到打通的渠道，而视康德为桥梁。这层思考刚刚开头，只能有待来者了。

一般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不一定对，可以举出许多反证来。但是乐民这些书画确实是与人的气质是一致

的。不论从专业角度如何评价，凡见过他的字的朋友第一个反应，不约而同都说是“文人字”，他自己也认同这一提法。他从来对自己的著作、文字、书画都不大满意，而从审美的角度，对别人也相当苛刻。有几位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年名人字画，他就是看不上，评价不是“俗”，就是缺“根底”。他始终认为，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解放以前，学校作文、机关文书都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机关用人的考核内容之一就是写字，所以毛笔字整齐熟练的人不在少数。而其中雅俗的区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有些被认为写得不错的，他评

为“账房先生字”，另一种是“师爷字”，规矩而没有个性。每当我为自己字写不好遗憾时，他安慰我说，至少你写的不是儿童体，也不是账房先生字。这是最低要求了。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逛书店，惊喜地发现中华书局出的一本《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连忙买回，这是为纪念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1912—1992）而出，其中收集了一百三十位近现代文化名人在 1949 年之前与中华书局的通信，最早的信是茅盾写于 1913 年，最早的人是梁启超，其中少数人在此集出版时还健在，而今健在的好像只有黄裳先生了。这是极为珍贵的墨迹，所有的信都是毛笔竖写，因为是普通事务性来往（谈版

权、稿酬之类)，都很随便，有的整齐些，有的字迹潦草，涂涂抹抹，字体也各有千秋，不过多为读书人的字，很少“账房先生字”，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放在现在，可以作为“书法”来欣赏。令人惊奇的是刊于篇头的一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致新城先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亲笔信，内容是感谢赠稿费三十元，请捐给东北义勇军。虽是武人，那笔字却也相当拿得出手。这更说明在那一代人，写毛笔字是日常之事，而真要成为“书法家”，那是十分困难的。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乐民最喜欢讲的典故是沈尹默开始小有名气后将自己的字送给陈独秀看，陈独秀批曰：

“其俗在骨。”沈尹默受此刺激，发愤换笔，从头苦练，尽脱俗气，终成大家。

春蚕到死丝未尽（6）

乐民书画称不上“家”，但也不是随便涂鸦，是经过正规训练，有些幼功的，而且少时曾入迷此道，做过书画家的梦。虽然此梦未成，还是读了不少名家碑帖，用心揣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惜以前的作品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总的说来，他的风格属于清雅一类，画以写意为主（他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写意，在朦胧，这是西洋画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字则瘦骨嶙峋，一如其人。他说幼时奉母命，先从临赵字开始，但是他认为赵字弄得不好就会失之柔媚，所以后来很

注意多临欧、柳。他认为初学最佳入门应该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有了这个垫底，以后再从其他名家得灵感，就不会流于浮滑。当然更应该临魏碑，可惜他自己在魏碑上没有下工夫。在常见的领导人的字中，他对周恩来的评价最高，周字显然是有魏碑的底子的。

他的审美重含蓄，在各种艺术部类中他之所好不约而同地都属于古典派，标准也比较苛刻。例如他对京剧老生各派中独推崇余叔岩及其弟子孟小冬而不喜欢人气旺得多的马连良。特别是认为号称“马派传人”者，没有发扬马的长处而多强化了他俗媚、夸张的一面，结果把群英会中的诸葛亮演成了“妖道”。

（这是转述他的话，艺术欣赏各有所好，我无意对京剧流派进行褒贬。）冯绍雷君有同好，专门给他录下了全套余叔岩过去灌的唱片（所谓“十八张半”），还有孟小冬仅有的录音，共三盒录音带，他十分高兴，暇时常放一放。昆曲则喜俞振飞的书卷气。他于画，后来日益喜欢倪云林，而把余叔岩与倪云林相比，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此外，他屡屡称道程砚秋的《锁麟囊》和《荒山泪》、《春闺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高出其他京剧剧本一头，一般京剧没有那种悲剧意识。“春闺梦”在1949年前后两朝治下都曾犯忌禁演，以其不合时宜地宣扬和平反战。《锁麟囊》则在1949年以后的

意识形态沉浮中曾几度被禁又开禁，程砚秋的一个心愿是将此剧录制电影，最终以剧本“鼓吹阶级调和”而未果。乐民每言及此都叹息不已。他也不是一味维护“传统”。例如他对《大登殿》十分反感，认为内容腐朽、艺术上也无足取，应属淘汰之糟粕。不过近年来在“弘扬京剧”的名义下，出现了许多所谓“创新”，以影视手法改造传统剧目，满台光怪陆离，把京剧“糟蹋”成这样子，令他愤慨不已、痛苦不堪。

他对西洋音乐是外行，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在他开始重听之后，更喜欢在读书写作时放交响乐以为背景音乐，用一种愉悦的乐音填充那寂静。一般说

来，非专业人士，特别是非欧洲人，都容易欣赏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而不容易接受巴赫，以其旋律单调故。但是乐民独喜巴赫，这可能与他审美的古典和含蓄的品味是一致的，与爱好余叔岩如出一辙。

从审美的角度，他不喜欢美国。1991年他曾有机会到美国作一个月访问学者，接待单位当然少不了安排他参观了白宫和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圣彼得、圣约翰大教堂，这两项建筑都是欧洲人设计的。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的本土再不肯盖这样粗糙的东西”，这话也够尖刻的。在学术上，他也认为美国人太实用主义、太政治化，非“左”即

“右”，总要分“派”，最后常落实在如何影响现实政治或政府决策，难以作超脱的、形而上的探讨，这点与当下中国社科学术界相同。（以我多年与美国学术界打交道的感受，也有同感。）再者，美国人把欧洲和加拿大都当作自家事，不列入“国际”研究范畴，更少有兴趣与亚洲人谈论欧洲。如果谈欧洲，他们关心的还是中欧关系一类的话题。所以他那次访美印象不佳。不过从理智上，他看好美国的新、朝气与活力，就全球化的趋势而言，他断言是欧洲向美国靠拢，而不是相反。令我意外的是，他偶然看过一两集卡通片《米老鼠与唐老鸭》竟很赞赏，说从中感受到一种没有什么不

敢想、不敢做的完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无边想象力，这样熏陶出来孩子才能出发明家。

春蚕到死丝未尽（7）

他晚年越来越痴迷弘一法师的书法，可能与心境有关。我家有一本《弘一大师遗墨》，他在扉页钤上了“云无心以出岫”和“万物皆一”两枚闲章。时常披阅。这点与慎之先生有相通之处。记得慎之说过他看弘一法师的字有时感动落泪。我向乐民提起此事，说我能看书、听音乐感动落泪，但是不大能想象如何看书法能落泪。他说他能体会，弘一法师的字的确有此感染力。我慧根浅，单是盯着那字看，不会动情，但是想到李

叔同其人的一生，想到当年落马湖畔那些人：丰子恺、夏丐尊……那种风骨、情操和才华，永远消逝，难以再现，不禁为之怅然、凄然，而今乐民也随他们而去，永远唤不回了。

他作书、作画纯粹是自娱、寄情，没有任何自命风雅之意。对文房四宝极不讲究，这大概也是限于条件，如果有条件考究，他还是很懂行的。他常为买不着好笔而苦恼，即便专门到琉璃厂荣宝斋去挑，用起来也不尽如人意。他很怀念儿时几毛钱一支的“七紫三羊毫”，如今很难觅得了。他常用的一张砚台是1957年我们结婚时我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我还记得当时在琉璃厂以十五元购得。

他说虽非古董，但还是上品。他用纸也随便，买到什么是什么，也不必上好宣纸。早年夏天飞机上发扇子，他就拿来画或写扇面，所以不少扇面上有“中国民航”字样。本集中“残墨、废纸、秃笔”那幅字就是在一张很不规整的破纸上，塞在角落里，我和女儿发现以后给裁齐铺平，感到字与词都有代表性，值得保留，就收在这里了。用女儿的话来说，“他特别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凡人找他要字，他几乎有求必应。亲朋好友自不必言，有时是主动相送。1999 年的一幅山水画上的题跋称有两位同窗一下子就选取了十几幅，“不知彼等如何处置”。现在其中一位已经过世，另一位也

久未联系，既是他们自己选的，当是比较可入眼的，这次也没有收回。有素不相识者自称好此道，写信来求字，他也基本满足。有一次装修房子，那包工头看他在写字，说自己也喜欢写写毛笔字，求老先生给写一张，他也随手给了他一张写好的篆字，还应他的要求，题了名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应该效仿某作家，他的字可不如你，但在门上贴出不菲的润格价钱。他笑笑说，我没那么大气，字不值钱的。

10 月间我到上海，见到《文汇报》“笔会”版主编刘绪源君，提到出书画集事，他说他有一幅乐民应他之请送给他的字。他曾问他有没有见到用古体文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佳作。乐民就抄录了胡适用楚辞体翻译的拜伦《哀希腊》送给他。刘君将已经裱好的送到旅社给我过目，竟是两米多长的一幅长卷，中楷行书共十六段，我大为惊喜，请他拍摄下来，补充在本集中。与此同时，乐民还为此译文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先贤可畏”，发表在“笔会”，现也一并收入。这是意外的收获。还有几位朋友在知道此事后主动送回几幅，尚能及时收入，多有题款。其余我不知道的、散落各处的尚不知有多少。

一般说来，享年七十八岁，算是“年逾古稀”。但是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黄金年龄大多被浪费掉，端赖寿长，或可做

些自己想做的事。乐民的重要著作、大量的书画是最后二十年带病运作中完成的，却略无病态。自从1992年确诊为“不可逆转”之后，开始了漫长的与医药为伴的日子。前十年保守疗法，需要对饮食起居严加控制，遂经常营养不良、日见虚弱；后十年血液透析，饮食可以放开一些，却从此拴在机器上，行动受限制。每周三次，疲惫不堪。他说自己的“有效生命”去掉了一半。不过第二天又精神如常，那一半生命发挥最大限度的效力。事实上，另外一半也非完全失效，在初步适应了透析之后，他每次都带一本书去医院，大量的经典就是在这四小时中读的。这样读的书必须小而轻，

单手可以举得动。因此，他特别痛恨当下出书开本越做越大、无关的装饰日益花哨，说那是为了装点书架，而不是给人读的，好在他要读的旧书多、新书少（指出版时间不是内容）。另外他还有一个本事，是我从青年时期就发现的，就是能打腹稿，先想好了，提笔一挥而就，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闭目养神时还可以酝酿文稿。这是他效率高的秘诀之一。

春蚕到死丝未尽（8）

生老病死，多非人力所能左右。他的病确诊后，我只有长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医生连病因都无法查出，我们也就不作“当初原该如何如何”的无谓“总结”。只是他有一项不幸中之大不幸，

就是做血透的“痿管”应该做在左臂上，却因医生手术失误，左臂一根血管报废，只好再换做在右臂上。否则，他的右手一直运用自如，生活质量将大不相同，至少后十年能从心所欲地写字画画，可能更有所精进，会留下更多精品。但是再追究医生的责任已无济于事，只得算了。朋友们都知道他一直坚持用毛笔写文稿，不用电脑。殊不知到最后，右手肿胀日甚一日，他自觉可能坚持不了多久，曾试着练习左手写字，而且要我教他电脑。他竟不得不想学电脑，令我心酸。我也的确教会了他简单录入。不过这离他最后辍笔已经不远了，终于没有用上。最后几篇文章是口述，请一位助

手听写打印的。他平生梦想有一张如儿时家中那样的中式大书桌，而且可以不必贴墙放，以便作书画时大幅的纸张可以两边垂下。我们始终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赖女儿的努力，终于换得现在比较宽敞的住房，可以放下大书桌了。他十分高兴，勉力扶杖与我一同去家具店，亲自看中了几张，自己量好尺寸，准备搬家后就去选购。孰意搬进新居后不久，他就体力衰竭，只能坐轮椅了。他自知从此不可能再坐到书桌旁，就嘱我不要再买书桌，而是设法定制一张像医院病床用的那种活动折叠小案板，以便他在轮椅上读书写字——一直到那时他还在做写作的“长远打算”！不过轮椅也只坐了

几天，就紧急住院，从此不起。大书桌、小案板，都成空！他也一直渴望有一张过去家中堂屋摆放的那种条案。承蒙阎连科君在我们乔迁时专门定制一张，但是送来时他已入院，也终于没有看见。

他生活俭朴，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例如对美食颇有所好。少时家道中落之前也曾有过家厨，他讲起那位大师傅的拿手菜，总是不厌其详，津津有味。只是我们自己都不善烹调，所以家中伙食从简。80年代结识“三联”的沈公，每招饮辄欣然前往，倒不是全为口腹，而是那种文人雅集，饭桌上的品味不低的天南地北的闲扯，也是一乐。可惜，这一乐也由于他后来耳聋日益加剧而被剥

夺。耳聋对他真是雪上加霜，失去了许多与人交流的乐趣，加深了心境的沉寂。不过也许另一方面能使他不受干扰，潜心学问，提高了效率。他对美景、名胜都兴趣盎然。近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有江南之游，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后来改为秋天。因透析条件的限制，只能游走于沪、杭、宁三地。那里有不少熟悉的朋友，他对这一年一度的旅行都很期待，不惮旅途劳顿，“秋尽江南草未凋”，良辰、美景、良朋、美食，是老病中之一乐。

21 世纪元年，我们有了一个外孙女，小名丫丫，从半岁开始，每年都回来与我们至少同住一两个月，成为我们晚年

生活的亮点，更是乐民的“提神剂”，每当丫丫来时，精神为之一振，似乎病也减轻些。“丫丫一点一点长大”（这是她在四岁时自己发现的），兴趣越来越广，其中一项就是画画，随心所欲地涂抹，不讲比例，却讲故事，丰富多彩。于是祖孙二人可以共同作画为游戏。本集中有两张是给丫丫的，其中一张是爷爷在猪年画给孙女的贺年片，饱含童趣和幽默。最后一次相聚是2008年春，丫丫七岁。一共只有七个年头的断续相聚，小小的心灵中却已充满爱和眷恋。听女儿说他们不得不把噩耗告诉她时，她始而表现得很理智，甚至说些有哲理的话，但到晚上伤心痛哭，无法接受再也见不

到爷爷的事实。今夏再来，她只见到遗像和骨灰盒。她以各种形式表现对爷爷的思念，包括画他的头像，捏许多小动物放在他的遗像前，等等。她不断地要求我讲有关爷爷的各种轶事，从如何生病到年轻时的情况，问得很细，我都认真地如实回答。但有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例如她问：你们互相送过什么生日礼物？还有一次忽然问：你和爷爷是谁先说“我爱你”的？我为之语塞。我说奶奶这一代中国人不这样说话，我们也没有互相送过生日礼物。她颇为不解，这与她熟悉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以及当下见到的、经历的生活很不一样。

春蚕到死丝未尽（9）

丫丫天真的追问引起我回顾半个世纪的相携相处，可以用“精神的”和“默契”二个词来概括。多少事，尽在不言中。我们的确从来不过生日，没有互送过礼物，包括结婚也无所谓定情的“信物”，唯一的就上面提到的我母亲知道他喜欢写毛笔字，送过一块砚台。那个年代，一切风花雪月、诗情画意都为“革命”所扫荡，送花之类更谈不上。除了时代背景外，与个性也有关。我们都特别怕繁文缛节、怕柴米油盐，直到70年代从干校回京，才勉强安家。多少年在一起出入各种场合，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穿什么衣服，当然也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衣物。“文革”初期，在“一锅端”

下乡之前，我们单位先在京郊建立了临时“干校”，我属于第一批下放，他则暂时“留守”机关。天气开始转冷时，有同事回机关办事，难得乐民想到托她给我带寒衣，我打开包裹一看，竟是八岁女儿的小棉袄！此事传为笑柄，成为同事间的一个“段子”。我戏说：他是九方皋相马，完全不注意外在特征，不辨颜色，不分大小，只要不像九方皋那样连牝牡都不分就行了。其实，在他生病前我也几乎没有为他买过衣物，80年代初我第一次赴美做访问学者期间，他穿着已经露棉絮的破棉袄上班，单位的女同事看不过，拉他去做了一件新棉袄。我回国后，她们和我开玩笑说：“老陈活到

五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我反唇相讥说：我们同病相怜。这是我的“平等观”。他对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对这“平等观”的尊重。是由衷的，不是迁就和被动，是出自他自己男女平等的理念，也贯穿在他对其他事物的态度中。他从来不要求我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我对他的评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大男子主义低级趣味的人。”我们虽然在同一“界”，甚至在同一单位工作，只是长年奔忙于各自的领域，从维也纳回国后，出差都从无机会同行，所以也常是离多聚少。本集中的欧阳“夜夜曲”，就是他在1992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写的，以此寄托思念之情。这就是他

的表达方式。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知道我在关注什么问题时，常常会忽然拿一本书走到我书桌旁，指给我看某一段话可能对我有用。我在电脑上看到他可能感兴趣的材料也常打印出来给他。实际上我的打印机基本上是为他而设，而今几乎闲置了。短短的午晚餐和喝下午茶的时间是我们交换心得的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有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那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放下手头的工作，一杯红茶、几块小饼，融精神与物质享受于一体，似乎人生到此别无他求。当然有时免不了争论，以后各自再找论据。他有很深的幽默感，总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趣事，或者于一些普通的

人事、话语中看到荒诞可笑之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充实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直到他被宣判为病人，我才开始关注起家里的起居饮食。尽管如此，他仍然尽量一切自理，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如他最后写的那样，理性地、科学地对待自己的病。一切遵照医嘱，自律、自爱，堪称模范病人，实际上也减少了自己的痛苦。血液透析是现代医学的一大成就，同时也有很大局限性，是对身体内在机能的慢性消耗，导致失调，需要尽量做弥补，在各种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中维持脆弱的平衡。因此他日常用的药物品种繁多而服法复杂。这些药他都

自己摆放得井然有序，按时、按量服用，从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一向不赞成有些妻子把丈夫当孩子，无微不至地严加监管，不是限制饮食，就是整天追在后面给吃各种药。而我在长达二十年的与病人为伴中，没有陷入那种妻子的境地，是乐民对我最大的体谅和帮助。当然，我也与他一道“久病知医”，时或共同对他病情作科学的探讨，对最佳的生活安排达成共识。而同时，我的生活、事业基本不受影响，甚至还能短期出国。他基本上不把自己当病人，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压抑感，而是有许多正常的享受。

不需要鲜花，不需要礼物。几十年

来从“误入尘网中”到祛魅、到解惑、到有所悟，我们几乎是同步走过来，很难说谁受谁的影响。在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历程中，这“同步”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最大的幸福。2007年7月碰巧有电视台到家中采访，记者得知那一年那一月适逢我们金婚纪念，要他当场给我写几个字。他写下了“志同道合，相互提携”几个字，并题为“金婚纪念”，落款陈乐民。这是他送我的最后礼物。这八个字包含了我们相伴一生的丰富内容，现在连同那幅欧阳的“夜夜曲”永远挂在我的卧室。夫复何求？

（2009年11月）

附：悼亡诗寒鸦又见绕枯枝，长隔

幽明两不知。

宿草庭园人踽踽，空房永昼日迟迟。
苏子还乡肠断处，微之闲坐自悲时。
千古人情同一恨，鼓盆庄子万难齐。
误落尘网同破网，归来书巢天地广。
中西徜徉求会通，古今游弋任俯仰。
奇文疑义每相争，趣事逸闻同抚掌。
斯人斯疾奈天何，君去我留独怅惘。
风雨同行五十年，死生参透似非难

诚知此事终须有，賸得琴书不自怜。

再遇妙文谁共赏？更临胜景忍流连。
几番梦破疑君在，孤影昏灯一泫然。
思接千载视万里，丘壑在胸笔底流。
泼墨唯求抒怀抱，著书不为稻粱谋。
身虽多病犹寻乐，心系斯民难解忧。

老死春蚕丝未尽，文心一脉思悠悠。

忆杨朔（1）

最近忽然接到电话，一名南方的记者向我了解杨朔的情况，我惊讶之余，略感欣慰，至少他还没有完全被遗忘。由此勾起我一些尚能回忆起的亲历片段，赶忙录下，以免再被时间磨洗掉。国华君殷勤约稿，以此文聊以塞责，作为野史旧闻，亦可为今日之青年增加一些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杨朔是老革命、知名作家。我开始知道这个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

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巍巍的“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对于我这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只有仰慕的份。没想到，几年后就因工作之故，与杨朔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大约 1957 年之后，杨朔开始参加“和大”（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简称，与中国亚非团结委员是同一机构）的工作。他主要工作在作协，同时兼任“和大”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一度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后来成立了亚非作家协会，他是亚非作协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我与他接触就是在这一范围内的各种国际会议の場合。

他很早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当过战地记者，到过延安，革命经历丰富，又是名作家，在那个时候我们后生小辈是只能仰视的。不过在我印象中他完全是白面书生，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而且还没有文人浪漫不羁的作风。他对工作很认真，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在代表团内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与其他领导干部不同的是，发言稿都是他自己动笔，如果经团长审查有什么意见，他一般不坚持己见。他与我们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处，态度谦和。一般来说，代表团出国以后，不像在国内那么等级森严，气氛比较放松，在廖承志、刘宁一两位喜欢开玩笑

的领导带头之下，谈笑风生，笑话不断。有不少才气横溢的人物如李一氓、夏衍、冀朝鼎、唐明照、张香山等，还有驻埃及大使陈家康也是有名的才子，都妙语如珠，互相之间经常有善意的取笑。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人家取笑他，他也只是一笑，很少反击。他一直是独身，这也是别人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廖公常逗他说，某某女士看上他了，要他抓紧机会。他也只是笑而不语。对于他终身不娶，有各种说法，一说是他原来有一位感情很深的妻子（或未婚妻？）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曾经沧海难为水，不再作他想。还有说他并非有意独身，只是知己难逢，没有遇到合

适的。以我对他的认识，这两种说法都可信。他是非常老实而认真的人，工作如此，对个人感情大约也是如此。

杨朔英文也很流利，平时与人交往、开会发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只是同他的中国话一样，英语也有浓重的胶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译名发音，例如“he comes from 加拿大（读如 Jia Na Da）”，“I went to 东京（读如 Dong Jing）”，令人忍俊不禁。陈家康大使开玩笑说，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到了伦敦，讲的就是杨朔式的英文。进入 60 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常常“吵架”。杨朔也用

他的胶东口音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我没有随他常驻过开罗书记处。陈乐民大约在1964—1965年间随他一起在开罗工作，讲过两件趣事：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照例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竟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曰：“stupid returns to you!”

（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还有每次会议之后，文秘处（都是埃及工作人员）整理出会议纪要（英、法文），发给各位书记。有一次，杨朔批评他们没有忠实记录他的发言，遗漏了重要的话（顺便提到，在中苏分歧公开之后，埃方的态度是依违于二者之间，而埃方工作人员，特别是两位英法文十分流畅的资深

翻译，对中国人不大“友好”），于是下一次，翻译记录故意整他，交来一份记录稿，把所有破句、错字、语病，以及“嗯嗯、啊啊”多余的口头语都照样录上，使人无法卒读，气得杨朔够呛。这些只是花絮。总之，杨朔一直忠于职守，工作无可挑剔。与此同时，他很勤奋，笔耕不辍，在这期间又写了许多散文，大多与非洲风光和独立斗争有关。

忆杨朔（2）

我曾于1962年8月随团参加日本广岛一年一度的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代表团长是巴金，杨朔是团员之一。那时，国际和平运动中在反对核武器问题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本身，包括强调核爆炸微尘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另一种是强调武器在谁手中是不一样的，反对就事论事，必须指出罪魁祸首，把矛头指向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我国当然属于第二种立场，所以在日本，对日本原子弹受害者表示同情的同时，竭力把日本人民的怨恨引向美国。（我多年后在“日本人为何认罪这么难？”一文中提到：我们对日政策不一贯，曾经一度为了集中反美，就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责。例如在原子弹问题上，那个时期就不大提及太平洋战争的责任问题。）巴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大会发言，自己写了发言稿，征求杨朔意见。其中有一句（看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苦难）

“我的心在流泪”。杨朔看后，提笔就把“流泪”二字改成“燃烧”。我在一旁，私心对杨朔钦佩之极，觉得到底是老革命，就是高明：“流泪”只是同情，而“燃烧”是怒火中烧，立即有了战斗精神，一词之差，境界迥异。这是我当时的想法，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回过头看“我的心在流泪”倒也很符合巴老宅心仁厚的特点。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作为领导干部——所谓“当权派”，少不得要挨批斗。杨朔本来属于作协，并不在“和大”上班，何时正式调到“和大”，为何在“和大”“参加运动”，我就不清

楚了。现在记忆模糊，对“批斗”杨朔的会印象不深，好像开他的会比较少，而是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反动”思想，写出大字报。我有一点印象的是，说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之所以对这点留下印象，是因为我最早看《三千里江山》时恰好感到他把那个知识分子写得很不堪，完全站在批判的角度，而且作者对此人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这还算是“美化”，是否知识分子就不该有任何出路了？杨朔的散文文笔优美，但内容是与时俱进地配合政治形势的，所以对他作品从政治上挑剔，作各种反面的解释，实在是

牵强附会。我记得一次会上，杨朔曾企图为他的作品辩解，被主持人打断。另外他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认为是“变修”的证据之一。他对这点诚恳地接受，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有房产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此外，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像他在“和大”并不是主要批判对象，因为他并不负责“和大”的日常工作，许多人也不认识他。直到1968年，军代表进驻，造成了他的悲剧。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批判“反动路线”之后，原来的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和大”的“造

反派”以 1966 年毕业刚分来的大学生为主，他们就是“革命小将”，当仁不让。一切都按当时社会上的潮流而动：破四旧、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等等。不过平心而论，相对说来，还算温和，没有“关牛棚”、打人、武斗。只是“批斗会”上喊口号，大字报上无限上纲。被选出的造反派头头（称“勤务员”）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一名业务拔尖的高材生，他比较“讲政策”，多次制止动武，并且反对“扩大打击面”。另外一些人（例如勤杂工、打字员等）就不大满意，觉得不过瘾，有人贴大字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实际上那时单位里还没有统一的权威领导，逍遥派还不

少。军代表来了之后，接过了运动领导权，有了权威，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他们“依靠”的对象“阶级路线”也甚鲜明，经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久就宣布说“和大”的运动右倾，对走资派太宽容，阶级界限也不清，这些人整天出国与帝修反打交道，怎么可能没有更严重的问题？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批斗对象都隔离起来。大约有六七人，多为原“和大”的领导干部，杨朔也在其中，还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姚某，虽非“当权派”，但据说有反动社会关系，并且解放后还有联系，也被隔离审查。他们被集中到一间大会议室，食宿都在其中，不能回家，白天写检查

交代。同时在军代表领导下给每人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审查。在军代表讲话之后，有一个经常把“光屁股长大”挂在嘴边，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大约他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我听说军代表说先冷他一下，给他点压力，让他好好交代问题。谁知杨朔就绝望自杀了。

忆杨朔（3）

我碰巧成为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况是：几位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睡在一间大会议室，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凡没有任务的（例如参加专案组之类）闲散人员都要轮到，日夜各两人。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有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盥洗、如厕，一般不出来，其实他们也绝不会逃走。那天晚上正好轮到我与一位男同事值班。那是盛暑，里面的人都是赤膊，只穿一条短裤。我一个女的，觉得很别扭，就尽量

“非礼勿视”，目光不向玻璃门看。大约九十点钟，他们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到走廊尽头的盥洗室洗漱，然后回房睡觉。我见到杨朔也在其中，并无异样。到了半夜，我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忽听里面那位比较年轻的姚某喊人，我仍然不愿进去，就在门外问怎么回事，姚出来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姚的床大约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我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好几个管事的，可能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那姚某是懂一些医学的，他还掰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医院，

以后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记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军代表宣布杨朔抢救无效，已经去世。据说发现他床头有安眠药瓶，医院诊断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大家都知道杨朔一直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量。

刚开始隔离审查，就有人自杀了，这在当时也应算是运动领导的失误（例如怎么会允许他身上带这么多安眠药？抢救是否及时？）。但是军代表当然不会认错，反而开大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而且还罗列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其中又提到自购私宅，生活奢侈，“冬有冬宫，夏有夏宫”云云。并分批

组织大家去“参观”他的住宅。我发现他所谓的“豪华住宅”就是一进小四合院的半边，沿着游廊拐过来，不记得有几间屋，好像也不多，并未超过当时与他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的规格，只不过别人是“公家”分配，他是私宅，不占公家的，反而成了罪状。所谓“冬宫”、“夏宫”云者，就是他在不同季节选择睡在不同朝向的房间而已，那时没有空调，冬天还可以节约点煤。印象中还见到他有一个养女，当时大约只有十来岁，我还曾闪过一个念头，她不知会有什么反应，以后将如何生活。但是以我当时的处境，这些都不属于我可以过问的事。

后来我和一些熟悉他的同事分析，

杨朔当时在“和大”并不是受冲击最大的，也没有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军代表刚刚进驻之后要匆匆走上这条绝路呢？我们都认为还是由于他太老实，太相信党，也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对他的批判，他还可以认为是“小将”胡来，运动后期总是会有正确结论，会“落实政策”的。但是军代表被认为是毛主席派来的，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指示，有至高的权威。杨朔大约真诚相信他们的话就代表最高领袖，那么，在他们进驻后，他的帽子反而升级，变成敌我矛盾性质。

（看来他也真的认为那地上的几个大字就是秉承军代表的意思，而军代表就是

奉旨给他定性。)他于是要求谈话，急于表白自己，而又被拒绝。这样，他就绝望了。这是我们的分析。君子可欺以其方！杨朔本人最后究竟怎样想的，已无法知道。记得他过去在闲谈中曾提到过杨刚（共产党内著名才女、名记者，50年代自杀）和杨枣（杨刚之兄，名记者，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于狱中），说他们兄妹都是极有才华的，结局那么惨，真可惜。呜呼！岂料杨朔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学养、才华、文字的锤炼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真挚的感情，

如果在另一种无拘无束的氛围中得到自由发挥，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个性、更精彩的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的。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

——忆廖公近来我在回忆往事中经常出现一个人的声音笑貌，那就是廖公（承志）。翻翻资料，发现今年正是他诞辰一百周年，却未见有什么纪念的动静，谨录此残留于记忆中的片断，作为对他的百年祭。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显赫生平、杰出的贡

献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种传记和无数文章，还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轮不到我来赘言。只是因为他的诸多职务中，也包括“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有幸多次随他出国开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本文所叙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见廖公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五十

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我的印象，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现在动辄说某领导人外语如何如何，实际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

理，不过重要谈话他还是愿意通过翻译。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他的时候居多。他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欢他。哪一次会议“Mr. 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英国“和运”的一位领导人蒙塔古（Ivor Montagu），是贵族世家蒙塔古之后，又是英共党员，还曾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他长得人高马大，肚子尤为突出，与廖公比较熟，也是廖最喜爱画的对象，侧面、正面像都十分传神。在中苏分歧已经难以弥合而尚未公开化

之时，英共是站在苏共一边的，蒙氏常为苏方做说客。有一次小组会上，蒙塔古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廖公刚好坐在他对面，低头在本子上画，等蒙塔古讲完一落座，廖公站起来，人家以为他要发言，他把手中刚画的蒙塔古画像举起示众，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发言，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表态、争论。

还有一次，休息期间，蒙塔古来找廖公谈问题，廖公先送给他一张他的漫画像，大肚皮很夸张，相与哈哈大笑，接下来谈很严肃的话题。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他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

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蒙塔古偶然说漏嘴。用错一个词（我不记得是什么词，大体是在当时进步圈子里“政治不正确”的用语），廖马上抓住，重复一遍，大笑说：“哈哈！我们的蒙塔古同志竟这样说！”弄得对方很尴尬，急忙辩解、更正。一忽儿，休息结束，重新开会，廖公向他顽皮地摆摆手，回到座位上。结果一场严肃的谈话不得要领而罢。蒙塔古是苏方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对。中方既不能同意，又还没有到公开反对苏联的时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给打发了。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开玩笑也

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支持或援助，他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满足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2）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是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在总的气氛向左时，他交代工作时率多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说不要顾虑别人说你“右”倾。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

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有一次“和大”某个活动原来应该有廖参加，但是他因接待一批重要的日本客人，没有来，刘宁一开玩笑说：日本人一来，廖公就“万般皆下品”了！足见他对对日工作的重视。那时虽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日本的民间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关系从来没有断过，在日本有许多真挚的朋友。这为以后形势转变时顺利建交打下基础。所以中日关系是“以民促官”的典范。这当然与当时中央的决策和周总理亲自掌握有关，而廖公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

中，对待苏联，他是当仁不让的。我感觉他对苏联早有意见，在“牢不可破”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陷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她回到美国，当然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而美国左派也追随莫斯科，不接纳她，使她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当时在

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经历，对于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子”。

他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很少犹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

“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他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箱中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公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后来那位苏联代表那次讲话被当作苏联“污蔑民族独立运动”的例证写入了中苏公开论战的《九评》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又当别论）。事后他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半开玩笑地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

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

他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听他闲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只自称是“国际坐牢专家”：外国的、中国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监狱共坐过七次：日本三次，荷兰一次，国民党两次，长征路上做张国焘囚犯一次（后来“文革”期间为周恩来特殊保护软禁五年，他自称算“半次”），几番九死一生。记得他讲过在张国焘那里当囚犯，本属于被杀之列，是他的画画才能救了他，张需要他画宣传画，才暂时留他一命，铐着手铐走长征路。后来周恩来来到张国焘那里，巧妙地把他救了下来。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3）

他阅人无数，许多名人轶事信手拈来，都是趣闻。说到讲日语，他说日本男、女以及不同身份的人用语都不一样，特别是敬语和语尾，一听就听出来讲话人的身份。例如一位女同志（当时也已是领导干部）原来在解放区做日本战俘工作，结果学了一口流利的“丘八话”，改不过来了，现在每当接待日本代表团，说话就露馅，他（廖）也不能制止她讲日文，毫无办法。还有过去在日本留学时，有个中国同学日语很差。忽然有一段时间不露面，同学都不知他哪里去了。过了几个月再出现时日语大有进步，但

是一个大男人讲了一口特别谦恭的“下女”（即女招待）话，同学就都知道他这段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混了。还有一些当时已进入老年的名人，年轻时在国外留学的逸事，他也讲过一些，例如某男士追求某女士，拿出“程门立雪”的功夫，真的在大冬天在门外站了一夜，等等。他还讲他过去恶作剧的事，最得意的是趁人睡着之时把他两只脚的大拇指捆在一起，等他起身下地一定摔倒。诸如此类，当时如果记下来，可以编成“新笑林”。他自己讲完就哧哧笑，很开心。

他对自己的“胖”不以为意，还常常自嘲。常爱讲的一桩軼事是，裁缝为他量衣服，发现腰围比裤长要长，起先

不相信，量了好几次才相信。说到这里他也开心大笑。他饭量极大，食欲旺盛，典型的广东人什么怪东西都吃，在国内只要夫人经普椿在场，总要受到约束，但是一出国就放开肚皮吃。一次在瑞士山区一个小镇上一家以蜗牛著称的餐馆，每份蜗牛一大盘，别人都吃不完，他一人吃了双份。南亚特产榴莲，许多中国人闻之掩鼻，飞机、酒店，都不许带进去，但是他视为美味。有一次，我们代表团经过仰光。李一氓时任驻缅甸大使，一见代表团就说，见到名单中有廖公，知道就是冲榴莲而来，所以早已备下。打开榴莲时，我和几个女同事都躲得远远的，他笑我们“太没文化”，自己大快

朵颐。还听陈乐民说，一次在加纳开会期间乘汽车在公路上走，忽见一大田鼠从车前跑过，廖公大为兴奋，立刻叫停车，让同行的小伙子去追，居然给追上了。当晚中国使馆的大师傅剥皮红烧，他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乘飞机，我坐在他旁边，见一份外国杂志上有一则关于减肥的报道：某人原重三百多磅，减肥成功后减了差不多一半体重，其秘诀就是吃一种降低食欲的药，使食量大减。我介绍他看那篇文章作参考。他看完后说：“那样人生有何乐趣哉？不干！”

我那时很瘦，食量极小，坐在他旁边吃饭成鲜明对比，他总觉得不可思议，说吃这点能活吗？简直是吃猫食！于是

给我起绰号叫“小猫”，在他画的众多漫画中有画我的猫头人身像，穿着旗袍，头大身体小，猫脸上还戴一副眼镜，居然还真像。他送给过我一张，可惜我没有保留下来，不知何时丢失了。直到“文革”后再见面，他还当众叫我“小猫”。不过他对比我年长许多的干部也叫绰号，有的已是老太太，他还叫她“小姑娘”，我也就无所谓了。

他在两个人面前决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照顾备至，执礼甚恭。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我亲自见到 1966 年，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

会，尽管“文革”已经开始，那次大会还是很隆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前在一间贵宾休息室内，坐满了与孙中山有关的故旧和海外来的亲属。周恩来总理进门环视一周，立刻回头问：“小廖，何老太呢？”廖说在另一间休息室。周说，赶快把她请来。于是廖连忙出去，过一忽儿，自己推着何老太的轮椅进来了，并站在她身旁，俯首介绍前来问候的客人。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4）

有一次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赫鲁晓夫为斯特朗平反后，1958年斯特朗来中国定居直到去世，由我所在的“和

大”接待，每年都为她举办生日宴会，而周总理每次都亲自参加)，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廖答称还没有来得及看。周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特别严，正是对他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以后，回头向别人

吐吐舌头。

还有一位与廖关系非同一般，廖对她绝对尊重的人是宋庆龄。我没有亲见过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听说只有廖是能随时登门见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概廖成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对宋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廖公的确喜欢广为阅读外国报刊书籍，出国时常让人“弄”些来看。我第一次知道《洛丽塔》这本书，竟是从他与旁人谈话中听到的。那时他们谈起来神秘兮兮的，我虽不知内容，但听得出

是禁书。多年以后，此书正式传入中国，想起刚出版时廖公就已看到，才体会到他是如何“开放”。

“文革”开始以后，我再次见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访华之时。那个时机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之前，是一段短暂的批“极左”的喘息期，气氛略松动一些。周总理乘机抓紧落实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廖也在其中。他是海伦点名要见的人之一，安排与她吃了一顿饭。多年不见，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较憔悴。但是一开口说话，神情依旧。海伦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真好！”他哈哈大

笑。后来还向别人说，这位夫人有个特别的问候方式，就是“啊，你还没死”！那次只叙旧，不谈时事，海伦很兴奋，话比较多。她见他活着就满意了，却没有问他这几年的遭遇，这样，廖也就避免了对“文革”讲违心的话（当时对海伦·斯诺的接待方针之一，就是要让她“理解”“文革”）。

从中日建交到改革开放，当然是廖公大显身手的机会。另外侨务工作，也是廖公有特殊优势的领域。我记得他说过，他收到许多访问香港的邀请，但是他不敢去，因为廖、何两家在香港远近亲戚至少有四百人以上，他如何应付得过来！当然还有散见于海外各国的也不

在少数。正因为如此，侨务工作的领导非他莫属。

1982—1983 年，我第一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中美开展学术交流之初，双方都很重视。那时我国在对外关系中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条，我自己其实思想也不大解放，但是过去至少有一些“看世界”的基础，这次有机会在美国获得感性知识，并比官方派出的人员行动自由一些，接触面更广泛，了解实情更多一些。不免对中美关系乃至我国整个对外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对我国的惯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只不过是一介布衣，人微言轻，如果有什么“建言”，通过正常途径，是很难

冲破层层关卡上达的。我当时能想到的、够得着的，而又估计能听得进我的意见的，就是廖公了。当然廖公当时又已担任各种要职，是大忙人，并不专负责对美工作，与我也不属于一个系统。但是不知怎的，我相信，我如果求见，他会见我，以他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和敏感是会有兴趣听我谈的。所以，我暗中决定，在1983年夏结束访问后回国，就设法求见他一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不料，就在我回国前，顺访加州，住在中国问题专家何里汉(Harry Harding)教授家，有一天早晨，他告诉我“廖承志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十分突然，黯然神伤久之。我失去了一个再见他的机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这样的人物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有来者，他才七十五岁，不能算老，在中国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2008 年）

此电子书由习之网 www.5sgou.com 搜集于互联网. 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 如要支持作者, 请购买正版